

# 疾病生态史视角下的徽州历史新探

## ——以渔梁坝与歙县血吸虫病为例<sup>1</sup>

顾维方，李玉尚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历史系，上海 200240）

**【摘要】**：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血吸虫病在歙县流行了 150 年。150 年间流行的大致趋势有三：一是由清中期的散发演变为晚清及其之后的大流行；二是由地势低洼地区向地势较高地区蔓延；三是在四条主要支流内，由下游向上游扩散。这种流行趋势与渔梁坝修筑、维持所导致的水环境变化息息相关。150 年间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区域，同时也是明清以来徽州府的核心区域。从疾病历史来看，清代中期之后这一核心区域成为“恶疫”之区，疾病造成人口损失，劳动力缺乏，导致疫区外来移民迁入和当地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也正是由于血吸虫病流行的缘故，一位籍籍无名的歙县医生江本良，第一次做了血吸虫病发生学的科学描述，展示了新安医学的贡献。

**【关键词】**：疾病生态；渔梁坝；血吸虫病；歙县

**【中图分类号】**：K9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7）06-0179-08

**【DOI】**：10.19563/j.cnki.sdzs.2017.06.025

### 一、问题的提出

渔梁坝位于歙县城南渔梁镇，距县城 1 公里左右，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也是徽州最知名的古代水利工程。<sup>[1]107</sup>对于如此重要的一项水利工程的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水利史、灾害史和环境史领域的学者，对于渔梁坝上游因泥沙淤积，各支流洪水频发，淹没农田和村庄的现象十分关注。事实上，与上述水环境变化相伴随的，还有“胀疾”的出现与流行：“故自坝沙阻塞以后，数十村落，近水居民，率多胀疾。”<sup>[2]559</sup>然而，并没有学者对渔梁坝上游水环境变化之后所伴随的疾病生态史进行深究。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渔梁坝所在的歙县为皖南血吸虫病流行重灾区。血防初期歙县 18 个区和 207 个乡镇中，有 12 个区和 61 个乡镇感染血吸虫病，流行区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30.2%。其中，尤以渔梁坝上游流域最为严重。<sup>[3]53</sup>职是之故，1950 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在歙县建立了安徽省最早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华东区皖南血防所。该所成立的第二年，在歙县进行“改水田为旱地”（又称“水改旱”）的消灭钉螺试验<sup>[4]5</sup>，效果明显。“水改旱”之后，“开新（河渠）填旧（河渠）”成为最主要的血防举措。随着“开新填旧”措施的实施，灌区河道、沟渠被截弯取直，水流畅通，疫区水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血吸虫病

<sup>1</sup>【收稿日期】：2017-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传染病对中国历史的冲击与影响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1&ZD1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顾维方（1987-），女，山东临沂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疾病史研究；李玉尚（1975-），男，山东即墨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疾病史、海洋史研究。

感染率迅速下降。

上述“坝沙阻塞以后，率多胀疾”的现象，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血防措施，表明水环境的改变也许是造成该县血吸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而水环境的变化与该县历史上渔梁坝兴修活动有关。本文依据歙县的地方志、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社会和经济情况调查报告及报纸等资料，一方面尝试建立起乾隆之后血吸虫病流行扩张史，另一方面探讨其水环境的变化如何导致该县血吸虫病的出现与流行。

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一般分为水网、湖沼和山丘三种基本类型，浙西开化县和皖南歙县都属于典型山丘型疫区，但主要流行因素则有不同。前者除了移民之外，主要是沿四条主要水系自上而下自然扩散与传播<sup>[5]</sup>；后者则主要是与渔梁坝这一徽州地区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息息相关。因此，歙县血吸虫病流行史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对于总结山丘型血吸虫病历史流行病学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可以从观察徽州区域社会发展历程中自然与人为如何相互交织。

## 二、渔梁坝与乾隆时期血吸虫病的出现

渔梁坝的雏形始于唐代，起初坝身为木质结构<sup>[2]557</sup>，真正叠石成梁始于宋代。修筑渔梁坝的原因，歙县历史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为截上流之水缓之，以利舟楫。据朱廷梅描述：“徽城东倚山，西、南、北三面距新安江，以置郡治，江合歙、黟、休宁、祁门、绩溪五邑之水，大会于歙浦，以入于浙，为滩三百六十，地极斗峻，水无停流。”<sup>①2</sup>此外，歙县境内有扬之河、丰乐河、富资河、布射河四条支流汇于此地，形成急湍飞流，亦不利于船只通行。第二种为束流蓄水，以利灌溉。徽州地区多山农，田地多以山为田埂，以便引山溪水灌溉，但山势陡峻，水速过快，无法直接引水灌溉，“惟有筑坝障水一法”。<sup>[6]268</sup>第三种为灭火。宋绍兴年间，城市频发火灾，此前木质结构的渔梁坝已废弃六十余年，于是，州守宋济于嘉定十四年（1221），“设栅聚石为坝”，目的是“修梁蓄水则火息”。<sup>[2]557</sup>

此后，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对渔梁坝的维修。嘉定十七年（1224）州守袁甫计划改用巨石为坝身，未成。绍定二年（1229）推官赵希想负责监修渔梁坝，将原来的以栅聚石而成的坝身全部改为石砌，共 18 层，并设斗门以泄水。弘治十二年（1499），知府张桢重铸渔梁坝，但此次修筑不久，坝即被洪水冲毁。弘治十四年（1501）知府彭泽命通判陈理督修，此次重修除了清除坝底的泥沙外，还将坝身改用方石修筑，并采用梯级造型，以缓和水势。此后又历经万历、崇祯两次重修，皆采用上述方式。<sup>[2]558</sup>

与此前多以官府出资修筑不同，入清以后渔梁坝的兴修多由当地士绅、商人甚至商人遗孀等捐资修筑。顺治十六年（1659）虽有兴修计划，但历时三十余年未实行。<sup>[7]1550</sup>清初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渔梁坝的计划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由徽州知府朱廷梅牵头，历时四年竣工。工程汇聚府县两级地方官及士绅、商人等各方人士捐资，采用更加坚固的青石、白石，设计三道水门，“层级而下，以时停蓄众流”<sup>[7]1552</sup>。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太守张廷炳议修葺之事。此次修筑由邑西稠墅节妇汪徐氏捐资完成。<sup>[8]68</sup>乾隆末年，渔梁坝再次崩坏，但此次修筑渔梁坝的提议因官员调动而未实行，致使该坝淤废百年之久，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当地程吴氏捐资重筑，耗时三年，渔梁坝才得以修浚。<sup>[8]68</sup>

自渔梁坝改石筑坝以后，历代对渔梁坝的重修都很重视排沙问题，石门的设置既有利于蓄水，同时也便于泄沙。但历经宋、元、明、清数次修砌，坝身早已堆砌成石埂，至乾隆末年，虽设有三槽，但槽与坝面相距甚近，已远不能发挥泄沙的作用，因此“有溜无泄，沙石日淤”<sup>[2]559</sup>。渔梁坝上游泥沙淤塞越来越严重，为钉螺孳生创造了条件。直至乾隆末年，疫病爆发，并为歙县当地人记录，描述如下：

先年坝沙浅则河底深，上游咸就安流。濒河田亩，亦收灌溉之利。自沙高河浅，坝塞不行。下流壅激，致上游旁啮。东山教场，频遭冲决，迁徙靡宁。他如桂林、黄荆渡、免苏、登第桥、东山营，水自扬之登源来者，沙壅而田多淤塞；岑山、瑞里、江村、长湖、范村、前山坝、叶家巷、步廊巷，水自布射来者，沙壅而田庐屡没；万年桥东两岸，夏雨暴涨，水深丈许，人家

<sup>①</sup>参见《徽州府重建渔梁坝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弘治）《徽州府志》下，上海古籍书店，第 775 页。

俱成巨浸，富蠲、沙溪、徐村、云塘、宋祁、汪仰村、新州，水自富资来者，沙壅而田多荒废；郑村、潭渡、百花台、古关、河西、水自丰乐来者，沙壅而河身日高，水发淹及庐舍；若城北及城南，皆水浅沙高，岸与河平，涨则河旁日就崩塌。坝之为害已极！即以风水论：出水之处，犹咽喉也，咽喉哽噎，则上下关窍不通，身将重困。地势所关，应在人事。故自坝沙阻塞以后，数十村落，近水居民，率多胀疾，历有明征。是筑坝求益，未尽其善，反招损也。顷稠墅汪绅，因坝石圯坏，输缙重筑，以培合郡风水，允称盛举。而寡识农民，乃窃议与其修之，无宁去之，是盖有疾于田庐之受祸也。<sup>[2]559</sup>上文系歙县医生江本良向徽州知府江恂的陈书。有关江本良生活的年代及其事迹的记载很少，从仅有的记述中可知，他是清代新安名医，通医术，并著有《飞布保命集》。<sup>[9]721</sup>知府江恂，生卒年不详，但据其生平事迹及“此书甫上，而江公谢事去，未及行”推断，上书陈于乾隆末嘉庆初。<sup>[2]560</sup>江本良的上述陈书详细描述和分析了渔梁坝上游因泥沙淤积，导致各支流洪水频发，淹没农田和村庄，致使“胀疾”流行的情形，是非常珍贵的疾病生态史史料，需要做深入的分析，如下：

1. 水环境之变化。徽州城北及城南“皆水浅沙高，岸与河平”，丰乐河流域“沙壅而河身日高，水发淹及庐舍”，富资河一带“沙壅而田多荒废”，布射河流域“沙壅而田庐屡没”，扬之河流域则“沙壅而田多淤壅”。从地形来看，徽州城、丰乐河、富资河、布射河、扬之河的海拔系由低向高分布。地势最低的区域，如城北、城南和丰乐河流域，泥沙淤积，河床抬升最快。民国年间歙籍人士许承尧观察，泥沙淤积最严重区域为河西（即丰乐河流域）及城北一带。<sup>[2]560</sup>低地地区河床抬升挤占了原先之水域，造成地势较高地区水位线提高，各流域水位线提高的幅度与海拔高度呈负相关。由此可见，江本良对于渔梁坝上游各支流水沙和水位线的描述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源于他比较了之前的情况：“先年坝沙浅则河底深，上游咸就安流。”

2. 对所记录的 25 个村落的分析。江本良记录了四条支流沿岸共 25 个村庄，其中 18 个今天仍然存在。这些村庄都位于各支流沿岸。据此推测，“数十村落”即为“近水居民”，两者系重复关系。从 18 个村庄的排列顺序来看，江本良是严格按照自上游向下游的顺序来记叙的。据此，7 个今天业已消失的村庄，即扬之河流域之尧苏，布射河流域之前山坝、叶家巷、步廊巷，以及富资河流域之云塘、宋祁、新州，都位于所在流域的最下游，从地形来看，7 个消失村庄都位于渔梁坝上游地区地势最低的区域（如图 1）。



图 1 清中期渔梁坝上游沙雍波及的村庄分布图

3. 何谓“胀疾”。在皖省流行较为严重的几种寄生虫病中，虽然黑热病和疟疾都有腹胀的症状，但黑热病多发于皖北地区，民国年间多有报道。<sup>③</sup>疟疾多发区与血吸虫病基本吻合，多水田和山溪的丘陵地区和多稻田的平坦地区多数属中度疟区，但其患

<sup>③</sup>①相关报道参见：《二十三年国内各地疾病概况及防疫设施情形》，《申报》1935 年 3 月 4 日；《蚌埠——黑热病蔓延皖北》，《申报》1936 年 8 月 4 日；《怀远——皖北黑热病流行》，《中央日报》1937 年 2 月 28 日；《皖北黑热病流行》，《申报》1937 年 4 月 14 日；《黑热病蔓延皖北，卫生当局亟应注意防治》，《申报》1947 年 9 月 8 日。

病率比血吸虫病低，且当地常以“打摆子”称之。“臃胀”是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常见症状，民国医师吴光、许邦宪认为，类血吸虫病的“水臃肿胀”之病症若成为一种地方病，则可确信为血吸虫病。<sup>[10]</sup>

4. 流行病学分析。前文已叙，江本良是通过对照比较的方式得出结论的，“胀疾”系“自坝沙阻塞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病。易感区域和易感人群是“数十村落，近水居民”。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数十村落”指的是他所提及的 25 个村庄，从“率多胀疾”来看，当时感染的村庄约 20 个。少数没有发生血吸虫病的村落，晚清时期亦被感染，如下文提及江村疫情发生在 1900 年前后。

从下文防治初期歙县血吸虫病流行分布情况来看，1950 年代渔梁坝上游灌溉区所涵盖的扬之河、布射河、富资河和丰乐河等河流沿岸的农田和村落，均属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区域。虽然血吸虫病在一个疫点出现后，几十年间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彻底摧毁一个较大聚落，但因各支流沿岸分布着数量较多的村落，同时由于疫区外来移民的缘故，在一个较大区域内始发之后，仍可以维持区域内上百年的流行史。清代中期血吸虫病在渔梁坝上游灌溉区内 20 个左右村庄流行，看上去并不是特别严重，很可能处于散发状态。20 世纪 50 年代血吸虫病典型疫村调查也能证明这一点。如据当地人回忆，江本良所提到沙溪乡的宋祁村，在光绪年间尚有 500 余口，但之后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人口逐年死亡、迁徙，至 1918 年时，村庄已绝户。<sup>[3]56</sup>从光绪年间尚有 500 多人来看，光绪之前血吸虫病一定不是特别严重。

从宋祁村因血吸虫病而消失来看，其余 6 个村庄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亡村。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歙县并不是个案，如扬之河流域的杨村畈和富资河流域的下坞塘、前头村等村，亦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于民国年间即已绝户。<sup>[3]53</sup>由于这 7 个村庄都位于歙县地势最低地带，意味着清代中期之后，渔梁坝上游灌溉区内血吸虫病感染率，在低地更为严重，以至于在江本良所提到的 20 个左右的感染村庄中，绝户村都集中在各支流最下游。

可能是医生的缘故，江本良观察到了血吸虫病的出现，并对其原因做了精准的推断，完全符合现代流行病学。这也是目前历史文献中对于血吸虫病发生学最具科学价值的描述。

### 三、晚清民国年间血吸虫病的扩张

晚清民国时期血吸虫病疫点仍然集中在上述河流沿岸，和清中期相比，向更多村庄蔓延，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兹根据 1950 年以后典型疫村调查分别论述之：

1. 扬之河流域。杨村畈位于桂林以北扬之河支流沿岸、天目山脉延伸段东部的山凹里，在 1913 年前后尚有 30 多户，但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整个村庄因血吸虫病的流行而绝户。该村以南的牌头村位于扬之河与其支流的交汇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 30 年内，竟由 500 余户降至 70 多户，仅胡姓一族就由 60 多户减至 2 户，整个牌头村因此被分为上、中、下牌头三个村庄。<sup>[3]54</sup>杨村畈和牌头村均属于桂林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村庄均位于河流沿岸。

2. 布射河流域。江村位于长湖以北、岑山以南，布射河支流沿岸，20 世纪初有万余人，但到 1950 年后只剩下 602 人。在这 602 人中，70% 的人口是来自江西、湖北、四川、安庆、浙江等地的移民。下坞塘位置不明，推测位于江村附近，在 1930 年左右有 20 多户，但至 1948 年仅剩 4 户。<sup>[3]54</sup>与清中期相比，该流域血吸虫病疫区向北扩散，且江村一带的疫情爆发于 1900 年前后，晚于下游疫区。

3. 富资河沿岸。富资河沿岸是血防初期典型疫村调查最多的地区。上文中所提及的宋祁村位于徐村以南，仰村以北，该村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人口由光绪年间的 500 余人，至 1918 年村庄已绝户。<sup>[3]56</sup>此外，位于富资河东岸的新屋里和松山两村地处富埭村以南、沙溪以北，因血吸虫病的流行，两村人口分别由 20 世纪 20 年代的 20 人、200 多人减至 1953 年的 12 人和 40 人。另有位于同一区域富资河西岸的后塘和双元两村，亦由民国年间的 200 余人，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40 余人。总体来

讲，富渇一乡在新中国建立前的 20 年内人口减少了一半。<sup>[3]56</sup> 相较于乾隆末年，血吸虫病流行呈现出沿富资河向上游扩散的趋势，光绪年间扩散至宋祁村一带，民国时期扩散至富场村以南的广大地区，且所有疫村均沿河分布。

杨村畈和牌头村均属于扬之河流域之桂林乡，其血吸虫病开始大规模流行发生于 1910-1920 年。该区域严重的血吸虫病甚至引发了远在上海的《申报》的注意。1929 年《申报》刊载《歙县东乡之奇闻》一文，描述了该县东乡 60 年来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院南歙县东乡之埭头、贵林、大和川等处周围约四十里，地属平原，垄亩相望，而景色清幽，居人最宜。乃该处有一离奇之事，由来已六十年矣。盖凡男子如饮食该处之水，即患腹胀面黄之疾，而病者饮食之水如仍取给于此，则病势日重，药石罔效，竟至于死。唯一患此疾即离该地，则虽不药，亦能自愈。尤奇者，该处周围四十里内之水，男子均不能沾口，且此奇事仅发生于成年男子，而妇孺不及焉。是故成年男子皆不取住于斯。<sup>[11]</sup>

以县城为界，县城西部丰乐河流域下游的平原区为西乡，而县城东部扬之河流经的平原和丘陵区为东乡，北部的黄山山脉区为北乡，县城南部和东部山区全部为南乡地域，占全县面积近三分之一。贵林即现在的桂林乡，埭头和大和川地望不明，推测在桂林乡附近。因东乡平原区自北向南为一狭长地带，宽约 3 千米，桂林乡至县城约 9 千米，所以东乡“周围约四十里，地属平原”应为四里之误。

据《申报》报道，1870 年左右，血吸虫病即在东乡平原地区流行开来。“腹胀面黄之疾”，与江本良所说的“胀疾”一致，颇似血吸虫病。“此奇事仅发生于成年男子”与该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主要为男子有关。当地传说“腹胀病”的流行是因为“鳊鱼”作怪，人吃了这种水，就要大肚子，无药可救等。<sup>[3]53</sup> 此即《申报》所说的，“男子饮食该处之水，而腹即胀，确为事实”<sup>[11]</sup>。

因“腹胀病”的流行，歙县东乡桂林一带，“附郭田野皆草深数尺，如数年未经耕种者。问之士人皆云本地人皆不愿种田，因种田者二、三年后常生膨胀病而死”<sup>[12]</sup>。因此，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田价。据 1929 年 5 月铁道部组织的经济调查队对京粤线安徽段的调查可知，歙县田、地价格均以铁路沿线最高。就田价而言，该县最高 240 元，最低 30 元，普通 100 元，尤以南乡、西乡的田价最贵。<sup>①</sup>而东乡桂林一带的田价因“腹胀病”的流行远低于市价，由每亩百金降为每亩二三十元。<sup>[3]</sup>《申报》作者也指出：

该处六十年前，并无此事，而烟户共有数千家。自此奇事发生后，或家亡，或迁移，烟灶日减。至清光绪庚子辛丑间，则所存之烟户，仅百数十家，今更寥若晨星。而此寥寥无几之住户，其男子均终年在外，即有时返家，亦小住数日即行外出。该处地多田畴，而田户咸住于四周数十里外，故每处稼穡上场之际，则农民均于田畔搭盖茅舍，以为暂时食宿之所。然男子皆不敢前往工作，故该处力田者，胥农妇也。<sup>[3]</sup>

根据《申报》，1870 年前后此地有烟户数千家，至 1900 年前后仅剩百数十家，至 20 世纪 30 年代就仅存少数几家了。血吸虫病在 30 年间把一个千户大村毁于一旦，60 年间彻底摧毁。当地土著男子多数外出，在乡者则不敢力耕，因此力田者多为农妇，1936 年调查该地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时，即检查出一例大便含有血吸虫卵的女性汪邵氏，“四十一岁，种田，脾大已六月，腹大已三四月”<sup>[12]</sup>。

1936 年，桂林村 41 岁的汪邵氏被确诊为血吸虫病，是由于这一年铁道部在京衢铁路宣衢段徽州一带测量路线时，发现此处居民患腹胀者极多，遂函请卫生署派人调查病因及提出防治方法。卫生署派员重点调查了歙县桂林、竦口，绩溪霞间以及宁国胡乐司等地。据调查，桂林一带有居民七八十户，两百人，其中农民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从户均人口来看，这是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方。调查患腹胀者 7 人，查出大便中有血吸虫卵者 3 人。竦口村有居民 200 余户，约 500 人，农民占人口的 1/5。调

<sup>①</sup>参见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查编《京粤线安徽段经济调查总报告书》，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1929 年，第 102、104 页。

查腹胀者 6 人，于 3 人大便中发现血吸虫卵，未发现血吸虫卵的患者中均有发热、脾大及血痢等病史。从流行环节来看，扬之河水清流急，无水草亦无钉螺，而在稻田较多的桂林车站一带的田沟内，钉螺密布，“每公尺约可采集万余”。<sup>[12]</sup>

四、新中国建立初期血吸虫病流行的继续

1953 年，为推广“水田改旱地”计划，歙县对血吸虫病流行比较严重的 6 个地区进行重点调查，并对疫区血吸虫病流行程度划分等级，以制定改田为地的计划表，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歙县血吸虫病重点疫区情况调查

| 区  | 乡   | 流行程度 | 户数<br>(A) | 口数<br>(B) | B/A | 患病人数<br>(C) | C/B<br>(%) | 大肚病人<br>(D) | D/C<br>(%) | 水田   | 旱地   |
|----|-----|------|-----------|-----------|-----|-------------|------------|-------------|------------|------|------|
| 富竭 | 富竭  | 严重   | 591       | 1485      | 3   | 303         | 20.40      | 56          | 18.48      | 1986 | 911  |
|    | 沙溪  | 最严重  | 495       | 1231      | 2   | 355         | 28.84      | 71          | 20.00      | 3054 | 848  |
|    | 江村  | 最严重  | 406       | 1017      | 3   | 306         | 30.09      | 34          | 11.11      | 2438 | 937  |
|    | 清流  | 严重   | 377       | 933       | 2   | 287         | 30.76      | 38          | 13.24      | 2399 | 854  |
|    | 岑山  | 最严重  | 422       | 1094      | 3   | 181         | 16.54      | 40          | 22.10      | 3041 | 329  |
|    | 稠墅  | 严重   | 599       | 1701      | 3   | 390         | 22.93      | 25          | 6.41       | 5044 | 692  |
| 城关 | 潭渡  | 严重   | 700       | 2088      | 3   | 345         | 16.52      | 55          | 15.94      | 2723 | 2327 |
|    | 潭石  | 最严重  | 464       | 1132      | 2   | 449         | 39.66      | 81          | 18.04      | 3074 | 1018 |
|    | 桂林  | 最严重  | 666       | 1633      | 2   | 453         | 27.74      | 72          | 15.89      | 3865 | 1350 |
| 岩寺 | 岩寺镇 | 一般   | 1138      | 3355      | 3   | 109         | 3.25       | 59          | 54.13      | 6358 | 796  |
|    | 竭田  | 严重   | 791       | 2245      | 3   | 311         | 13.85      | 68          | 21.86      | 5556 | 789  |
|    | 瑶村  | 最严重  | 415       | 1211      | 3   | 425         | 35.09      | 49          | 11.53      | 4023 | 368  |
|    | 信行  | 次严重  | 300       | 871       | 3   | 108         | 12.40      | 28          | 25.93      | 2953 | 545  |
|    | 西溪南 | 一般   | 638       | 1963      | 3   | 90          | 4.58       | 39          | 43.33      | 4500 | 112  |
|    | 洪坑  | 一般   | 439       | 1495      | 3   | 24          | 1.61       | 7           | 29.17      | 2872 | 76   |
|    | 郑村  | 最严重  | 598       | 1727      | 3   | 536         | 31.04      | 34          | 6.34       | 2041 | 1096 |
| 潜口 | 潜口  | 一般   | 565       | 1960      | 3   | 76          | 3.88       | 5           | 6.58       | 2376 | 389  |
|    | 谷山  | 一般   | 570       | 1871      | 3   | 85          | 4.54       | 37          | 43.53      | 2850 | 100  |
|    | 竦塘  | 一般   | 674       | 2470      | 4   | 16          | 0.65       | 7           | 43.75      | 3232 | 1207 |
|    | 琶村  | 一般   | 519       | 1764      | 3   | 58          | 3.29       | 28          | 48.28      | 2570 | 372  |
|    | 唐模  | 次严重  | 474       | 1401      | 3   | 54          | 3.85       | 17          | 31.48      | 2655 | 310  |
|    | 澄塘  | 严重   | 517       | 1708      | 3   | 132         | 7.73       | 31          | 23.48      | 4078 | 568  |
| 溪头 | 溪头  | 次严重  | 435       | 1183      | 3   | 561         | 47.42      | 85          | 15.15      | 4786 | 775  |
|    | 竦口  | 最严重  | 652       | 1492      | 2   | 542         | 36.33      | 134         | 24.72      | 3741 | 1711 |
|    | 蓝田  | 次严重  | 240       | 794       | 3   | 32          | 4.03       | 16          | 50.00      | 1054 | 687  |
|    | 洪村口 | 次严重  | 525       | 1603      | 3   | 66          | 4.12       | 34          | 51.52      | 2244 | 506  |
|    | 西坡  | 次严重  | 260       | 919       | 4   | 170         | 18.50      | 43          | 25.29      | 1450 | 1026 |
|    | 坦头  | 严重   | 198       | 552       | 3   | 128         | 23.19      | 15          | 11.72      | 919  | 810  |
| 王村 | 富礼  | 一般   | 411       | 1531      | 4   | 16          | 1.05       | 5           | 31.25      | 1111 | 1201 |
|    | 草市  | 一般   | 502       | 1657      | 3   | 136         | 8.21       | 28          | 20.59      | 1889 | 1010 |

|    |    |    |       |       |   |      |       |      |        |       |       |
|----|----|----|-------|-------|---|------|-------|------|--------|-------|-------|
|    | 烟村 | 一般 | 630   | 2513  | 4 | 11   | 0.44  | 11   | 100.00 | 1839  | 1662  |
|    | 浯村 | 一般 | 492   | 1800  | 4 | 71   | 3.94  | 53   | 74.65  | 1917  | 1127  |
|    | 岭后 | 一般 | 499   | 1901  | 4 | 2    | 0.11  | 2    | 100.00 | 2590  | 754   |
| 合计 | 33 |    | 17202 | 52300 | 3 | 6828 | 13.06 | 1307 | 19.14  | 97228 | 27263 |

资料来源：据 1953 年“歙县血吸虫病区水田改为旱地三年计划统计表”改制，“歙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今后防治工作初步计划（草稿）”，安徽省歙县人民政府卫生科：《本府关于卫生、血防等工作指示、计划、通知等文件》，第 63 页，歙县档案馆，66-1-6-1953。

上述疫区包括 33 个乡、镇，17202 户，52300 人，占歙县总人口的 14%。感染血吸虫病的患者为 6828 人，感染率为 13.06%。其中，“大肚子”患者（即晚期病人）1307 人，占患病总人数的 19.14%。越是靠近山区，地势偏高的地区，“大肚子”的比例越高，如潜口的谷山、竦塘、琶村，溪头的蓝田、洪村口和王村的烟村、浯村、岭后等地。因为这些疫区发现得较晚，流行病学调查初期，治疗与预防血吸虫病的措施尚未介入，晚期患者较多。

受血吸虫病的影响，歙县重点疫区户均人口一般为 3 人，最严重的地区如沙溪、潭石、桂林、竦口等乡仅有 2 人，位于歙县西北和南部的山区一带，疫病相对轻微的地区尚可保证 4 人的户均人口数。

据表 1，20 世纪 50 年代歙县血吸虫病流行的主要分布区域为丰乐河、富资河、布射河和扬之河下游的平原地带，也是歙县最主要的水稻产区。该区东西长 38 千米，南北长 34 千米，面积达 1292 平方千米<sup>[13]554</sup>，流行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近 1/2。就疫区分布和流行程度而言，扬之、布射、富资三河沿岸血吸虫病流行程度较丰乐河流域严重，而乾隆末年“胀疾”流行最严重的徽州古城一带，在血防初期人群感染率低至 2.7%和 8.3%。<sup>[14]144</sup>就同一河流而言，下游疫区的血吸虫病流行较上游疫区严重。

还需要注意的是歙县西南王村区。王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浙江流域，本区西北部为丘陵畈区，东部和南部属山区、深山区，血吸虫病疫区就位于浙江沿岸的畈区内。据表 1，该区人群患病率普遍低于 10%以下。处于山区的其他血吸虫病流行区与王村区的乡、镇一样，因山势阻隔，疫区独立成块，属血吸虫病流行的“孤独块”，人群感染率一般都较低。据血防初期调查，轻疫区人群感染率为森村 0.5%、雄村 3.7%、坑口 1.6%、漳潭 2.5%、白杨 19.6%、北岸 4%、呈村降 3.4%、南源口 1.5%。<sup>[14]144</sup>

## 五、新中国建立后歙县水环境的改造与血吸虫病的消灭

1950 年 5 月，时任皖南行署卫生局副局长的方星，在了解了皖南各县、市血吸虫病流行的情况后，将其汇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将歙县东乡血吸虫病疫村村貌拍成照片呈送该部。11 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拨款在歙县建立了华东皖南血吸虫病防治所，是为安徽省第一个防治血吸虫病的专业机构。为获取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该所于 1951 年春在歙县桂林乡连瑞里村设立实验区和实验农场，普查钉螺和病人，并试行“改水田为旱地”的灭螺方法。<sup>[15]108、[16]7</sup>

“水改旱”的措施是在对歙县钉螺分布特点的认识和灭螺措施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据 1953 年调查，该县 82.06%的钉螺均分布在水田，重点疫区共有水田 97228 亩，旱地 27263 亩，水田面积是旱地的 3 倍。就“水改旱”的可行性而言，该县“水田的水源是山水溪流，只要修整排水沟，将水引入主流，水田即可变成旱地”<sup>[3]62</sup>。该措施一方面使田地保持干旱，外加频繁的除草和翻耕等，彻底改变钉螺的适生环境，以达到消灭钉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疫区居民的生产习惯，减少居民与疫水接触的机会，避免感染。

连瑞里村的灭螺试验取得成效后，1952 年，血防所又在歙县桂林、吴山铺等地建立试验农场，进行“水改旱”的灭螺试验。次年，根据重疫区的疫情和田地调查结果制定了“水改旱”的年表，计划于 1953 年在岩寺、城关、溪头 3 个区 7 个乡改田 16387 亩；1954 年增加富竭和潜口 2 个区，共 17 个乡，计划改田 21019 亩；1955 年增加王村区，计划将 6 个区 33 个乡内剩余水田全部改为旱地，共 59914 亩。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水田都适合改为旱地，如潜口区的五个乡，因靠近高山地区，土地地势偏高，

不适合进行“水改旱”。上述6个区中不能实行“水改旱”的田地面积占20%，即19446亩。<sup>[3]61</sup>因此，1956年“水改旱”的范围虽有扩展，但仍是试验的方式在歙县的几个重点疫区，如徽城、桂林、富渥和郑村等4个乡、镇开展，面积达34556亩。<sup>[17]53</sup>年底调查钉螺死亡率达60%~94.7%。1957年，“水改旱”灭螺措施开始向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太平等地推广。<sup>[18]422</sup>据1961年调查，歙县全县可施行“水改旱”的田地面积有62907.4亩，实际已完成59488亩。<sup>[19]4-6</sup>

随着“水改旱”的实施，田中钉螺大大减少，塘中、沟中钉螺变化却不大。<sup>[20]12</sup>一般来讲，“钉螺在稻田内的分布以人水口及靠田边的第一行禾兜为最多。其密度与毗连的灌溉沟成比例”<sup>[21]35</sup>。因此，1957年后部分地区逐渐将旱地回改水田，导致沟、塘中钉螺再次向田中扩散，引发田中钉螺密度提高。另据改旱区调查总结，“水改旱”适宜于生活下水感染不严重、水系不太复杂的地区。所以建议改旱的同时还必须在沟、塘、河内进行灭螺及结合管水管粪工作。<sup>[20]35</sup>

尽管“水改旱”是血防初期最适宜歙县的灭螺措施，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发展纲要相违背的，也损害疫区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因此，“水改旱”的血防措施只是部分疫区为消灭钉螺，阻断血吸虫病的流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灭螺取得成效后，疫区逐渐将旱地改回水田，沟渠钉螺随即向稻田扩散。

相对“水改旱”，“开新填旧”（指的是开挖新的沟渠，填掉含有钉螺的旧沟渠）是最主要的沟渠灭螺方式，也是歙县继“水改旱”之后实行的最主要的血防措施，主要用于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歙县吕竭、鲍南竭等灌溉区的灭螺。据血防初期调查，沿丰乐河水衍生而来的条垅竭、雷竭、吕竭、昌竭、鲍南竭两岸的西溪南、潜口、岩寺3乡、镇中的37个行政村均是血吸虫病流行区。<sup>[22]114</sup>以丰乐河下游郑村乡为例，1970年围绕鲍南竭的沟渠灭螺实施“开新填旧”的措施鲍南竭位于岩寺镇附近的丰乐河上，竭水自西向东流，分南、北支渠。20世纪50年代扩建后，包括干渠、南渠、北渠、斗毛渠等大小沟渠63条，灌溉范围自岩寺塔起，迄于七里头，受益地区涵盖梅村、向杲、瑶村、山坑、竭田、郑村、潭渡、柏村、潭坑、佑源等地。1970年冬季，将时有渠道全部实行“开新填旧”，调整水系，以消灭钉螺。<sup>[23]108</sup>丰乐河北岸的小姆竭灌区18条沟渠及棠樾村南部的大姆竭沟渠也在“开新填旧”的灭螺措施中被填埋。<sup>[23]；[24]3</sup>

消灭钉螺是阻断血吸虫病传播的重要一环。就歙县而言，血防初期以人工捕捉为主，并结合焚烧和填沟等方法，灭螺效果并不明显。1954年苏德隆分别在北岸乡和竭田村试验药物灭螺，钉螺死亡率分别为47%~97%和20%~78%。1956年以后在歙县几个最严重的疫区内开展大规模水田改旱地的工作，灭螺成效最为明显，据1957年9月调查，桂林乡水田改旱地后钉螺死亡率高达93.5%。<sup>[8]556</sup>在此基础上，1958年至70年代初实施的“开新填旧”，辅之药杀和火烧等措施，对钉螺孳生环境进行彻底改造，是歙县消灭血吸虫病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促使该县于1979年达到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最关键的一步。

## 六、余 论

到1950年，血吸虫病已在歙县流行了150年。150年间流行的大致趋势有三：一是由清中期的散发演变为晚清及其之后的大流行；二是由地势低洼地区向地势较高地区蔓延；三是在四条主要支流内，主要由下游向上游扩散，与浙西开化自上游向下游自然传播迥然不同。这种流行趋势与渔梁坝修筑、维持所导致的水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150年间血吸虫病流行最为严重区域，一直为渔梁坝上游灌溉区所涵盖的扬之河、布射河、富资河和丰乐河等河流沿岸的农田和村落，这一平原谷地同时也是明清以来徽州府的核心区域。

血吸虫病并未摧毁这一核心区，缘于各支流沿岸分布着数量较多的村落，其感染的时间并不相同，加之疫区外来移民的补充，从而维持了区域内上百年的流行史。

从疾病历史来看，清代中期歙县、绩溪等徽州府核心区域的地方社会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主要表现在：虽然之前人地矛盾突出，但并非“恶疫”之区；晚清及其之后血吸虫病形成大流行，造成疫区人口损失严重，由此引发疫区外来的移民迁入和

---

当地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歙县的衰落和位于其上游地区的屯溪的兴起，血吸虫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不容小觑。也正是由于血吸虫病流行的缘故，一位籍籍无名的歙县医生江本良，第一次做了血吸虫病发生学的科学描述，展示了新安医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郭因. 安徽文化通览简编[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4.
- [2]许承堯. 歙事闲谭[M]. 李明回, 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2001.
- [3]安徽省歙县人民政府卫生科. 本府关于卫生、血防等工作指示、计划、通知等文件[Z]. 歙县档案馆, 66-1-6-1953.
- [4]安徽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志[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0.
- [5]顾维方, 李玉尚. 太平天国战争后浙江省开化县的血吸虫病与移民[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7, (3).
- [6]康基田. 河渠纪闻(卷十五)[M]//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未收书辑刊(壹辑·贰拾玖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 [7]吴苑. 重修渔梁坝记[M]. (乾隆)《歙县志》卷十七《艺文志》.
- [8]许承堯, 等. 中国地方志集成[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 [9]万正中. 徽州人物志[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8.
- [10]吴光, 许邦宪. 吾国血吸虫病之大概(一)[J]. 中华医学杂志, 1941, (8).
- [11]敦厂. 歙县东乡之奇闻[N]. 申报, 1929-01-26(21).
- [12]任言永. 安徽歙县绩溪铁路沿线腹胀病调查[J]. 公共卫生月刊, 1937, (7).
- [13]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歙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4]钱信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地图集(中册)[M]. 上海: 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1987.
- [15]方星. 创办皖南血吸虫病防治所的经过[M]//歙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歙县文史资料(第2辑), 1987.
- [16]安徽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卫生志[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3.
- [17]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编辑小组. 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文集[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0.
- [18]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徽州地区简志[M]. 合肥: 黄山书社, 1989.

---

[19]歙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 关于血防、防疫、麻风病院工作方面的文件[Z]. 歙县档案馆, 档案号: 66-1-92-1961.

[20]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编辑小组. 血吸虫病研究文摘 (1950-1958)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21]卫生部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 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编辑小组. 血吸虫病研究资料汇编 (1958 年)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1.

[22]政协黄山市徽州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徽州区文史资料 (第 4 辑) [M]. 黄山市徽州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2007.

[23]歙县革命委员会卫生局. 关于血防工作的文件及省血防工作会议的材料[Z]. 歙县档案馆, 档案号: 66-1-71-1970.

[24]东南大学建筑系, 歙县文物事业管理局. 棠樾[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